

从社会学的批判到批判的社会学： 吕克·博尔坦斯基对法国社会学理论的推进

熊跃根

内容提要 作为社会学的发源地,欧洲一直保持了社会理论发展的强劲传统。它与北美注重实用和量化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大相径庭,一直致力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中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其中不仅包括社会批评,也包含对社会学自身的反思。吕克·博尔坦斯基作为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几乎是继布迪厄之后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然而,在国内,由于语言和翻译工作本身的困难,学术界对博尔坦斯基社会理论的关注与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试图弥补上述欠缺,致力于推进对当代法国社会学理论进展的分析与理解。通过研究博尔坦斯基主要代表作中的学说和观点,深入认识法国社会理论自身的传统及自反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全球化与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思考“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即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理论界定与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行动。

关键词 吕克·博尔坦斯基 法国社会学 社会学的批判 批判的社会学 行动与价值

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解释人类社会中的重大事件与变迁,并围绕“社会秩序”与“正义(或公正)”等关键议题展开持续论辩。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社会理论迫切需要回应这一当代全球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迁。然而,迄今为止的欧美社会理论对这一变迁的回应与解释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在德国社会学家约阿斯(Hans Joas)等人看来,当代欧洲社会理论的发展依然延续着一种雄心勃勃的理论抱负,那就是试图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来社会理论的发展进行某种综合和进一步推进。与英美不同,欧洲大陆社会理论的发展常与学派核心人物及其学生、同事的持续努力密切相关。比如在德国,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核心形成了交往行为理论学派,他的弟子兼同事霍耐特(Axel Honneth)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了批判理论学说的发展。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及其学生的进一步努力,推动了德国社会学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深入理解社会结构和系统功能的诸多变化。在法国,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他的学生,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他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会理论家和他的学生对理论学派推进的努力,都彰显了欧洲大陆社会理论的发展张力。多年来,这些立足于经验研究同时致力于揭示社会重大结构变化的欧洲社会理论家,一直在努力推进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和马克思(Karl H. Marx)所创立的概念与理论解释系统。他们敏锐地指出,古典社会学家所构建的理论工具已经很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制度裂变现象,并就此进行了深刻的理论辩驳。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很多新世代的理论家试图抛弃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转而迈入一种被称为“社会科学人文化”的学术进程。^①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既是对社会问题及制度实践的反思与批评,也是学科对自身的检视与创新探究。作为布迪厄的助手和同代人,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实用主义”和“批判”。他所建构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理论,其核心议题依然是人类正当性和解放的问题。生于二战期间的博尔坦斯基堪称当代法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其学说流布欧陆,在北美学术界也具有广泛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起,博尔坦斯基便与布迪厄长期合作,两人在早期的合著论文中便探讨过“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问题。^② 作为一位坚持自我反思甚至自我颠覆的社会理论家,博尔坦斯基曾在访谈中坦言自己讨厌一切教条主义(dogmatism)。他认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该领域自二战后尤其是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概念与知识体系提出批判,并宣称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进入了“后批判时代”。^③ 过去十多年来,博尔坦斯基的著述在欧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批判理论方面,为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与概念工具,也为沉闷的基于量化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注入了一股活力。然而,在中文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内地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者对博尔坦斯基著述和理论观点的引介与批评性讨论仍不充分。本文旨在弥补上述欠缺,对博尔坦斯基的主要学术观点与贡献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法国当代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图式,如何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精神与制度发展的危机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博尔坦斯基的《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资本主义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和《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三部代表作为核心分析文本,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和阐释博尔坦斯基的批判理论与他所开创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对推进法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与意义,并试

① 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7—478页。

② P. Bourdieu, L. Boltanski, “La Production de L’idéologie Dominan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 2, No. 2 (1976), pp. 3-73.

③ N. Duvoux, “The Empirical Sociology of Critique: An Interview with Luc Boltanski”, translated by M. C. Behrent, *Books and Ideas*, 14 February, 2012.

图讨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以及理论知识发展的可能路径。本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博尔坦斯基通过对布迪厄社会学的继承与发展,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了当代法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第二,博尔坦斯基如何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理解,恢复对古典社会学关键议题(如资本主义精神、剥削与不平等)的深度检验与学术对话?第三,博尔坦斯基所提出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与传统的批判理论之间具有何种联系?这种理论对于审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启发意义?

博尔坦斯基对布迪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法国新社会学的出现

因其研究领域广泛且对时代问题具有原创性的深入透视,博尔坦斯基被视为当代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尤其是2014年出版的两卷本英文著作《吕克·博尔坦斯基的精神:论〈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文集》,标志着博尔坦斯基作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的学术地位再次得到学界的认同。^①在阿隆(Raymond Aron)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后,博尔坦斯基于1981年在安萨赫特(Pierre Ansart)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业。其博士论文《一个阶级的生产:法国社会的干部》基于扎实的田野研究,成为经济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的代表作。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博尔坦斯基一直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职。1965—1984年期间,他一直在布迪厄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一度成为布迪厄的重要弟子和合作伙伴,致力于发展有别于美国的“实践社会学”或“实用社会学”(pragmatic sociology)流派。博尔坦斯基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学与社会批评的综合,将批评融入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与分析中,恢复法国社会学将哲学纳入社会理论分析的悠久传统。受布迪厄的学术影响,博尔坦斯基的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人类学特征,尤其注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日常分析,从而解释社会阶层的属性与特征。正如他在著作《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中所指出的,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关注权力、支配与社会秩序。与韦伯不同的是,博尔坦斯基一开始就使用了“社会支配”的概念,并试图避免陷入术语的历史考据之争,而将重点放在从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出发,探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法国社会)中的权力和阶层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就一种批判理论而言,其任务并非分析和解释社会事实的具体特征与构成,而是基于上述事实揭示不同客体与结构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坦斯基的学说延续了法国社会学对社会生活进行道德批判和分析的传统。德国学者盖丁格尔(Frank Gadinger)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对有关“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探究中,博尔坦斯基的社会学工作介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

^① S. Susen, “Luc Boltanski: His Life and Work—An Overview”, in S. Susen and B. S. Turner, (eds.), *The Spirit of Luc Boltanski: Essays on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p. 3–28; B. S. Turner, “Three Theories of Justice: Primary Reflections”, in S. Susen and B. S. Turner, (eds.), *The Spirit of Luc Boltanski: Essays on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p. 29–48.

^② L. Boltanski,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3.

论之间,试图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结构之间发现隐蔽的行动者,进而构建自身的批判理论。^①

按照博尔坦斯基的理解,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的宗旨,在于对既有的社会科学关于真知或真理的解释进行质疑和反思,寻找一种“反思性”的社会理论。与传统批判理论不同,实用的批判理论或实践批判理论并不依赖于集体的生存经验,而是基于这种经验进行深入反思乃至重建。在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掌门人霍耐特看来,最能代表博尔坦斯基批判的实用或实践社会学思想的,是其著作《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霍耐特认为,随着帕森斯功能主义宏观抽象理论的影响逐渐消弭,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基本上将道德问题的关怀意识祛除了,哲学的意味不再,绝大部分研究转向对经验事实的测量与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虽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将规范解释与可观察的社会事实联系起来,但在经验社会学主导的北美社会学界,这一理论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正是一群包括博尔坦斯基在内的法国社会学家,通过对社会理论的反思与重建,经由批判的实用社会学路径,重新激发了哈贝马斯的理论光芒。^②《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出版后,博尔坦斯基被公认为布迪厄之后欧洲(尤其是法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

(一) 博尔坦斯基对布迪厄学说的继承

二战结束后,社会学在北美(主要是美国)的发展,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支配性影响。与美国相比,法国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进程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完成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使命,但它仍然保留了较鲜明的法国传统,尤其是哲学反思性和学科的多元性。战后美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与商业管理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科学发展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研究进程。从冷战时期到石油危机爆发前,美国在市场经济与商业管理领域的制度化影响,在西欧国家(包括法国)十分显著。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业管理主义思想与实践方法在法国的科层机构与公司企业中几乎无处不在。^③作为当代法国社会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布迪厄的学说无疑对法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博尔坦斯基的学术路径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尽管两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研究路径上的分歧,但博尔坦斯基从未抛弃对社会支配和不平等的关切。自20世纪60年代起,布迪厄就一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担任重要职务,并凭借“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这一学术平台在法国乃至欧洲大陆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在此期间,博尔坦斯基也曾以助理的身份师从布迪厄,他在布迪厄指导下所从事的法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理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布迪厄学术思想的影响。

由于曾在布迪厄的研究小组长期工作,博尔坦斯基深受布迪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组成员,他与布迪厄及其团队共同致力于揭示社会不平等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机制。同时,作为法国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① F. Gadinger, “On Justification and Critique: Luc Boltanski’s Pragmatic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0, No. 3 (2016), pp. 187–205.

^② A. Honneth, “Dissolution of the Social: On the Social Theory of Luc Boltanski and Laurent Thévenot”,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376–389.

^③ L. Boltanski, A. Russell, “Visions of American Management in Post-War Franc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2, No. 3 (1983), pp. 375–403.

与理论反思的基本信念上高度一致。受法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传统以及社会学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两人均致力于分析和揭示社会秩序的任意性及其不平等后果,试图打破社会世界自然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象,揭示不平等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支配逻辑。他们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出发点,通过观察和分析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揭示其中的社会关系与结构张力。

(二) 法国新社会学的出现:博尔坦斯基对布迪厄社会学学说的发展

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的关系,是法国社会学史上一个极具张力的篇章。作为布迪厄的学生兼同事,博尔坦斯基一方面深受其学术影响,另一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学理自主性。在理论建构和发展上,博尔坦斯基试图摆脱布迪厄的影响,通过发展新的概念(如“元批判”[metacritical])和理论分析图式,以区别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反思社会学”。在博尔坦斯基看来,在社会学与政治行动之间寻求一种调和,并不是“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唯一宗旨。“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不仅要揭示社会事实与结构之间的复杂关联,而且要对这些事实本身进行重新诠释。同时,与经验社会科学(尤其是实证的经验社会学)不同的是,“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主要是为了避免对现实的复杂世界进行简单分类,同时也为了直面因结构或制度原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或不公正。^① 博尔坦斯基认为布迪厄的理论带有过多的决定论色彩,带有一种先知式的(甚至全知全能的)视角,而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总是处于被惯习和结构完全决定的被动角色,也并非缺乏道德判断与改变现实的能力。相反,行动者在现实的环境和情势中具有某种能动性。基于此,博尔坦斯基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批判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ritique),以区别于布迪厄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后来,为了进一步凸显自己的批判的社会学学说,博尔坦斯基称其为“实用的批判社会学”(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就研究议题与进路而言,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之间既有深刻的学术关联,也存在根本性的范式断裂。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博尔坦斯基的理论和研究兴趣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有关正义的不同概念及其表述,二是资本主义的转型。1991年,他与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合著《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该书继承和发展了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与批判社会学,并因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分析范式,宣告了“批判的社会学”或“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正式登场。在《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一书中,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探讨了社会存在的主要面向及其正当化过程,这一主题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核心的研究议题——正义(justice)——紧密关联。

与深受方法论个人主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不同,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并未将社会中的人(个人或群体)视为仅受利益(或工具理性)支配的“量化的人”,而是将他们视作处于特定相互关系或情势中的现实存在,上述关系包括“个人-国家”与“事物-国家”的关系。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试图在这项研究中,揭示并诠释在这两种关系中,人们将自身诉求合法化或正当化的“获取资格的行为”(the act of qualification),或者抵制某种被支配的策略。^② 在研究方法上,他

^① L. Boltanski,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5-17.

^② L. Boltanski, L. Thé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2.

们不仅注重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一手资料,也注重从统计资料中获取相应的经验材料。两人不同的学科背景(博尔坦斯基是社会学家,泰弗诺则是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促使他们对社会科学中的类别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受布迪厄实践理论中有关对运行与实践干预分类思想的启发,他们试图寻找人们“获取资格的行为”在定量与定性上呈现出来的类型、属性及其应用范围。比如,在问卷调查中,通常的做法是研究者预先设定类别,由被调查者从中选择。而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则通过交流的方式,引导研究对象自主描述其社会职业或阶层类别等。博尔坦斯基指出,在经验研究中,上述两种观察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相似性。^①

与布迪厄强调“支配”与“符号暴力”(或象征暴力)的决定性作用不同,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主张从社会生活中行动者自身的经验与反应出发,认为行动者在一个支配的结构中并非自动接受某种协议(合法性)的安排。相反,行动者会在特定的情势和环境下,根据自身的观念、需要和诉求提出差异性的观点,从而产生与预期的协议的歧义(disagreement),而“正当性”正是在回应和解决歧义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形式和结果。因此,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不会将“正当性”当作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一元性)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在回应具体诉求和解决不平等关系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同行动策略(多元性)。^②不同于布迪厄的批判路径,博尔坦斯基的理论出发点并非从生活世界出发去“揭露支配”,并借此批判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在于分析和辨别“批判”这一行动本身的产生机制,尤其是考察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的自觉行动与批判能力。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受制于惯习,对于内化了的社会结构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普通人陷入“误识”(misrecognition)之中,难以看清支配自身的真实机制。而博尔坦斯基则认为,在社会世界中的普通人具有道德能力和反思性,他们并非只是被蒙蔽,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能察觉不公,并能提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理由与诉求。同时,公正的标准与原则并无统一定义,在许多情形下,不同的行动者在特定场域或环境中持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形成自身的公正原则。尽管布迪厄和博尔坦斯基都注重社会学的批判,但是二者在批判方式与方法论上存在差异。布迪厄一直坚持“批判社会学”的路径,主张社会学家必须占据一个客观的科学位置,去揭示普通人意识不到的深层支配逻辑,承担启迪者或教育者的角色。而博尔坦斯基则开创“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摒弃这种社会学家作为先知或全能裁定者的角色,转而聚焦“批判”行动自身的产生机制及其作用方式。

在《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一书中,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首先探究了社会科学与协议(或共识)的合法性关系。正如两位作者所言,他们研究的目标就是试图构建一整套理论工具,进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框架,来描述和分析在社会生活中行动者如何避免受暴力的支配性影响,表达歧义,并逐步建构、呈现直至最终达成协议(或达成共识)。^③在书中,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基于对古代哲人和当代政治哲学家经典文本的研读与分析,围绕法语“cités”(英文的对应词是“polities”或“orders of worth”,即“政体”或“价值秩序”),对社会世界中冲突与共识

① L. Boltanski, L. Thé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5.

②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批判的资源》,臧峰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42—43页。

③ L. Boltanski, L. Thé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5.

达成的六种体系进行了区分与说明。他们借助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经典论述,引用斯密提出的“语法就是正义的规则”这一观点,以及德国法学家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关于“道德的量化”(moral quantity)的讨论,从商品交换中的自我利益角度,探讨市场与价值秩序或政体之间的相互关系。^①无论是斯密还是休谟(David Hum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乃至晚近的涂尔干,都认识到市场与个体利益诉求之间充满了多样性,个体的同情心、性情、声誉、品德与交易的共识达成之间存在多种面向。总而言之,市场是人们交易的公共空间,协议或共识的达成决定了物质或商品的外部性和本质。^②在此基础上,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归纳出六种主要的、彼此不可通约的城邦类型(或城市类型):灵感型城邦、家庭型城邦、声誉型城邦、公民型城邦、市场型城邦和工业型城邦。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框架,每一种城邦类型都对应特定的政治哲人及其代表作,代表了某种“价值的政治形式”。^③按照这一分类,在不同城邦类型(或城市类型)中,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与社会分层紧密关联,构成了等级化的价值次序,并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情境。两位作者指出,正是由于人们来自不同的城邦类型(或城市类型),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强加给所有人、并要求其按照神圣性法则来遵守的普遍协议规则,以期消解所有误解或歧义,最终达成协议或共识。相反,实际的情形更可能是,人们会根据自身的社会法则与群体价值标准,通过援引上述标准来证明自身利益诉求或批判的正当性。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20年,博尔坦斯基一直在理论上不断推进其“实用的批判社会学”这一学术工程。从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经济”,到提出一系列学术概念以构建一种“解放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再到转向对资本主义“致富经济”中商品问题(艺术品作为商品的交易)的分析与批判,博尔坦斯基一直致力于发展法国的新社会学,在这方面他与布迪厄的过往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最新的论著中提出,当代世界行动者的社会关系与商品领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资本家的富足不再与传统的勤俭和劳作相关,相反,有闲阶层会通过稀有奢侈品交易,来保持对商品交易巨大利润的支配性占有,进而实现“致富经济”(enrichment economy)。^④与20世纪60、70年代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中,“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生存环境,很少有人论及甚至批判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批判理论要么被当成刻板的教条,要么演变成一种解构现有思想和制度的方法论。在博尔坦斯基看来,如何使社会学既具有历史根基与现实穿透力,又不丧失科学性,是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基于此,在过去30年里,博尔坦斯基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建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经由经验研究论证,持续推进法国新社会学的发展,在理论上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实践的批判。

① L. Boltanski, L. Thé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4-45.

② L. Boltanski, L. Thé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53-61.

③ L. Boltanski, L. Thé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3-123.

④ L. Boltanski, A. Esquerre, *Enrichment: A Critique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p. 2.

重返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批判的社会学

自 19 世纪以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与内在逻辑,始终是社会学奠基者及后世学者的重要研究主题。无论是对不平等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质疑,都促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给出了各自的解释。然而,上述批判学说往往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的逻辑陷阱,缺乏对当下变化的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精神新颖而深刻的见解。博尔坦斯基与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可被视为当代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扛鼎之作。在博尔坦斯基看来,自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社会学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变化,逐渐成为社会批判的新对象。两位作者通过考察早期福特制资本主义的衰落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历史转向,从批判理论的视角解答了一个核心问题: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劳动异化现象,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来讲,为何资本主义仍在持续?为回答这一问题,博尔坦斯基与希亚佩洛借助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经典概念,重新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与劳动体制下隐蔽的支配与剥削,以及变动的劳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博尔坦斯基批判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得到了系统阐释。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两位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批判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ritique)与一般意义上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的本质区别:

所以,对行动者声称遵行的价值不加关注的批判社会学,必须被批判的社会学所取代。这里也必须说清,这种做法并不是要把批判束之高阁,而是相反,要使它的基础更为坚实。这种经由批判的社会学的迂回,具有启发式的意图,而不是一种政治谋划。^①

作为博尔坦斯基晚期的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不仅进一步回应了《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中阐述的规范性理论,更意在建立一个批判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原始资本积累和现代工业化阶段之后,发展出了一种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制度日益复杂化和科层化,却始终离不开逐利的目标。劳资关系矛盾与底层社会的不平等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不断恶化。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原动力日趋弱化,社会内部的改革力量也难以继。在此背景下,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巧妙地融合了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与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对资本主义正当性的批判观点,基于法国社会的经验事实,进一步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项目型城市”与“正当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两位作者试图将《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中围绕不平等与身份差异所提出的问题,从道德正当性的理论层面予以深入阐释。他们指出,过去 30 多年间,资本主义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新型组织形式和制度变革,而“项目型城市”所制造的组织参与形式,为工作的意义提供了某种正当化理由。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认为该书最具吸

^① 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钰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引力之处在于,两位作者对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里长期存在的网络化个体和公司如何聚焦于个体、项目与团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批判。^①

在批判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腐朽的制度,其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令人吃惊的荒谬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试图沿袭马克思和韦伯的分析思路,把组织劳工的形式作为界定资本主义的中心内容。^② 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现象的加剧,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繁荣之后经历了一次历史性考验,以“解放”为名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并未能破除旧制度,也未能重建更为公正的理想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尤其是 90 年代中期之后,以新管理主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旧有的劳资关系与生产体制,“效率”与“人性”在更为隐蔽的包装形式下,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进程得以暂时延缓,但劳动与资本、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基于丰富的案例和经验事实,试图说明大公司如何通过新的管理形式与组织惯例,将不满的各阶层就业者整合进自身的利润生产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除“追求利润”以外的“第二种精神”。在应用六种城邦或城市类型的理论分析过程中,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将不同类型的城市与不同身份次序的参与者联系在一起,以揭示公正的规范性条件如何在经历各种参与者的测试和检验后得以实现。两位作者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阶层(the working class)通过表达自身不满和寻求自身利益的方式,来测试和检验“正当性”,在这一过程中思考、判断、试探和辩驳有可能会成为实现某种协议安排的步骤,而这正是行动者批判能力的具体体现。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避免扮演一种全能或先知的角色,他们的目标并非通过揭露支配性的结构及其张力来引导一种社会批判;相反,批判的社会学的本质任务就是解释和说明行动者自身的批判能力。

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指出,19 世纪产业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形式,即艺术批评(以真实性呈现和解放为目标)与社会批判(以揭示贫困为目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管理资本主义时代里已失去有效性。^③ 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里,“追求利润”已经变成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此外,自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出现一个收入稳定、生活富裕的庞大中产阶级,但按照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话说,他们作为“单面人”,丧失了对社会的感知与认识能力,最后更失去了批判性。^④ 因此,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仅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放任发展的有限约束,其正当性被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内部行动者暂时加以内化,进而发展为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博尔坦斯基指出,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共同福祉”(实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功利主义变种)为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推行某种有限的改良。但这种观点的理论取向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反而带有一种伪善的倾向。在认识资本主义城市类型与正当性实践二者关系时,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尤其关注“项目型城市”,它既代表了资本主义管理的新形式,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批判实

① N. Fligstein, “Review on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35, No. 6(2006), pp. 584–585.

② 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钰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5 页。

③ 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钰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345 页。

④ 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

践得以展开的情势。在管理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网络、资本与技术实现了更为有效的整合。生产与劳动管理方式的变革,使就业保障形同虚设,无保障就业或不稳定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种常态,而这种状况恰恰成为激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行动者批判能力的必要条件。当资本主义依赖一种普遍的项目或项目管理形式,并建立起道德上某种新的规范性支柱时,这便为社会批判的复兴创造了条件。^① 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极富原创性和深厚的分析解释力,但是这种所谓的“新精神”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荒谬性和道德堕落的一种解药,本质上,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清醒剂——它提醒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注意在社会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批判角色与能力的实在性。然而,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行动者对批判自身的意识,仅代表了从资本主义破坏性中获得一种暂时解脱。资本主义积累在获得新形式的某种实践改进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城市类型与管理实践,如果缺乏外部强制性法律的介入,那么社会批判就很难实现本质上的复兴。^② 基于此,新的城市类型的出现和新的公正机制的构建,都会随资本主义内部秩序和不平等的发展演变而受到约束。关注新的行动者意识觉醒和批判能力的实践,将是批判社会学的重要任务。

博尔坦斯基的实用批判社会学:与传统批判理论的对话及超越

自涂尔干以来,法国社会学建立了以强调个人主义和经验测量为基础的实证社会学,试图以科学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传统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倡导对社会生活的道德层面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坦斯基提出并构建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旨在彰显现实世界中行动者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过往批判理论的知识,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支配的新形式及行动者开展批判实践的规范性条件的认识。《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系博尔坦斯基 2008 年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阿多诺讲座嘉宾所作六次演讲的结集。该书汇集了他多年来围绕“批判的社会学”和“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之间内在联系与区别的思考,并结合时代变迁与批判实践的新特征进行了总体性陈述,因而被学界视为其“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

在《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一书中,博尔坦斯基的核心目的就是试图构建“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理论纲要。他分析和解释了社会的构成、行动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及其实践。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信念之上:社会是由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实践与批判关系所构成的一条“生产线”。“实用的批判社会学”需要回答四个主要问题:第一,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对社会生活的最主要贡献是什么?第二,制度在社会生活建构中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什么?第三,“批判”(critique)在社会生活的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第四,随着社会生活的转型,

① 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钰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03—404页。

② 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钰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96—605页。

“解放”的可能性何在?^①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博尔坦斯基以“批判理论的结构”为主题,试图通过对“权力”与“支配”、“社会”与“社会秩序”两对概念的区分,梳理批判理论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资源(主要是借助韦伯与涂尔干的相关概念),进而理解社会总体性的一般特征与社会具体事实中的矛盾张力。在此基础上,他从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性入手,讨论行动者的道德判断、反思能力与批判形式之间的关联,指出行动者的道德活动是一种前置的批判行为。因此,对事实与价值二者的区分和相互关系的认识,无疑是引导批判理论理性描述支配关系与机制的重要前提。在这一部分,博尔坦斯基澄清了一般的“批判”与“元批判”的不同位置。他强调,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理论的地方在于,前者包含了反思性的目标,而行动者具有的不同反思性使其在社会事实中处于不同境地,批判能力本身与解放的方向保持着某种中介性的联系。在对支配与剥削进行语义学分析的基础上,博尔坦斯基分析了社会生活世界中行动者在支配影响下所拥有的知识与反思性,并指出不同的语言系统赋予行动者不同的参与事务与表达诉求的空间或机制类型(即六种城市或城邦类型)。^②

《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一书的第二部分以“批判的社会学与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为主题。这部分无疑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博尔坦斯基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再次系统地澄清他与布迪厄关于行动者与支配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的根本分歧。在这里,博尔坦斯基以“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来彰显自身作为社会学家在如何看待行动者能动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布迪厄坚持客观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立场,始终认为在一个支配结构中,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个体由于“误识”而无法发展出能动性与批判能力,他们被动地受支配影响,只有通过外部的社会学家作为启蒙者或引导者才能获得反思性。而博尔坦斯基提出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则坚持认为,普通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批判,是他们在支配情境下发展出的批判能力,也是行动者能动性的体现。批判的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它试图解释行动者对特定事物状态的屈服,强调行动者作为受害者所具有的信念和幻觉,行动者自身受制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结构,而这种观念已内化于其思想之中。因此,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就在社会世界里行使着特定的社会功能,使得社会阶层的差异与不平等成为一种建构的事实。

对博尔坦斯基创立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来说,“批判”本身即被视为一种社会事实。在他看来,社会学家不应再被看作“启蒙者”,而应客观研究人们在各类争端中如何援引不同的“价值秩序”(orders of worth)来表达不满、进行辩护和达成妥协。“批判”是行动者日常实践中真实存在的社会能力,而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具备这种能力。与批判社会学不同,“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持有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它认为社会世界是被行动者构建起来的,而非一开始就确定一个系统;而批判社会学则认为社会世界是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系统,行动者被这一系统支配。在博尔坦斯基看来,“全能的社会学”(overarching sociologies)从总体性视角出发,认为处于不利境地的行动者受限于支配的结构,只能接受总体性的标准,进而失去批判能力。相反,

^① S. Susen,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Reflections on Luc Boltanski’s *On Critique*”, in S. Susen and B. S. Turner, (eds.), *The Spirit of Luc Boltanski: Essays on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p. 175–176.

^② L. Boltanski,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3–4.

“实用的批判社会学”本身根植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事实,他们作为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与参与者,倾向于对事实制造近身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一种回应支配的认知与能力。^① 对博尔坦斯基来说,行动者的批判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能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规范能力。这是他的实践观点与布迪厄实践理论在本体论上的本质差异。总体而言,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在“批判”概念上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三方面:一般批判与元批判、简单的外在性与复杂的外在性,以及支配与剥削。在此基础上,博尔坦斯基在《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一书中进一步从制度的功能角度论述了社会生活的建构,强调行动者卷入争议或纠纷时的参与者视角,他明显不同于布迪厄视行动者为无意识的被动参与者,而将外部社会学家视为具备全能认知与客观外在性的主体,进而具备某种客观的外在性的观点。对博尔坦斯基来说,批判的关键在于人(行动者)置身于事中而非置身事外,这一在场性本身构成了行动者的反思性与批判能力。^② 在如何认识“批判”的问题上,博尔坦斯基强调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及其穿透性特征。行动者的认知、反思性与批判能力虽会因具体的情势存在差异和弹性,但这种批判能力对行动者而言无疑是必要的。就“实用的批判社会学”而言,博尔坦斯基理论工作的中心目标(或理论抱负)就是阐明“批判”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构成了人类对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推动力。因此,在博尔坦斯基眼里,对“批判”的认同或承认犹如社会生活大厦的关键基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各种政治机制,它们通过行政、区域、人口、经济等各种形式呈现出彼此的差异。在现实中,这些不同的政治机制通过各城邦(或城市)类型中行动者的正当性实践得以体现。而这一切的关键,用博尔坦斯基的话来说,在于“项目型投资”(projective investment)和“反思性介入”(reflective engagement)——它们被视为两种由批判力所驱动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③

如果将博尔坦斯基所创立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学的理论工程,那么其使命绝不是与其前辈所倡导的“批判社会学”争夺学术话语权,恰恰相反,它指向的是社会学实践本身的历史任务,即人的解放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在学术思想上的分歧,绝不应仅仅被视为个人学术发展的动力,而应被视为作为社会学人的一种道德关怀,即社会学家对社会生活世界里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公正负有道义责任,而这也是韦伯当年所说的一种承担使命的政治伦理或历史胸襟。在《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一书中,博尔坦斯基试图通过将“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理论纲领进一步明确化和具象化,以更系统的论述来深化对支配的社会批判。为明确“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与传统批判理论在“解放”目标与实践范畴上的区别,博尔坦斯基指出,并非所有的支配关系都必然直接塑造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具体阶层,因此“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应始终围绕批判赖以存在的制度条件与情境要

^① L. Boltanski,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44–45.

^② S. Susen,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Reflections on Luc Boltanski’s *On Critique*”, in S. Susen and B. S. Turner, (eds.), *The Spirit of Luc Boltanski: Essays on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p. 182–185.

^③ S. Susen,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Reflections on Luc Boltanski’s *On Critique*”, in S. Susen and B. S. Turner, (eds.), *The Spirit of Luc Boltanski: Essays on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 188.

素,并基于此考察不同类型城邦(或城市)中行动者的正当化实践。博尔坦斯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阐述,对“实用的批判社会学”而言,“解放”作为一种人类行动与社会群体的反思实践,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支配性结构中不同社会阶层在道德价值与实践策略上可能达成的协议(或共识)。为此,首先,社会学家必须认识到既有的“剥削”及其造成的不平等与支配机制;其次,在概念上须进一步澄清社会生活中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作为行动者的价值观;最后,区分“世界”(world)与“实在”(reality)二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包含意义或符号构成的精神世界,而后者则指向客观的现实世界。基于此,行动者必须认识到变革的目标与现实的建构之间的联系。对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来说,“解放”既是一种批判实践的理想信念,也是一种指向“人性自由”的日常利益诉求。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终极实践,“解放”使个人与国家、行动者与组织、激情与利益达到最大程度的共识而非歧义。它意味着战胜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不平等与不公正,这既是一种政治上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对共同生活的期望在日常经验中的具体体现。^①

结 语

本文以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两人的学术渊源为切入点,以博尔坦斯基的《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和《论批判:一种解放的社会学》三部代表作为核心文本,力图描述和阐释博尔坦斯基所创立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主要学术观点,及其对推进法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核心贡献与意义。一方面,博尔坦斯基继承了古典社会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支配与不平等关键议题的理论遗产。另一方面,博尔坦斯基在继承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经验研究与反复比较,在《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一书中,与泰弗诺建立了一个分析社会互动与批判的理论框架,目的在于阐释在日常互动与争议中行动者如何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并寻求协议或共识的达成。在与希亚佩洛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两位作者指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动力在于创造出的一种“新精神”,它通过新的组织形式与消解分歧的制度安排,掩藏了不平等关系中的潜在冲突,而批判所指向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并未真正消解。与布迪厄强调一种支配性的场域不同,博尔坦斯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自我限制机制,恰好为场域内的行动者提供了思考和行动整合的机会,进而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博尔坦斯基不认为在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强制和剥削体制里,作为行动者的工人、消费者和其他边缘群体是一群乌合之众,相反,他们具有思考和行动能力,能够在各种分歧和争议中找到“正当性”的逻辑。在博尔坦斯基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一种发展的结果,而是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条件,它通过“限制”(对工具理性的约束)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试图构建一种“正当性”的秩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与分配体制,其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消解了社会公平的基础,人为破坏了理想社会所应追求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博尔坦斯基以自身独有的语言方式,从概念和分析范式上勾勒出“实用的批判社会学”的理论元素和基本架构,强调了在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系统

^① L. Boltanski,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54-160.

中,行动者基于日常实践发展出的批判与反思能力。这一点对重新认识支配结构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富有启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目标、不断产生社会分化的制度,始终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基于此,社会学的批判实践价值在于构建一种指向自我觉醒和躬身参与社会变革的“实用的批判社会学”,以促进实现社会平等的解放事业。对资本主义精神或制度核心问题的思考、辩驳和追问,既是包括社会学学科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学术议程,也是社会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博尔坦斯基的学说构成了对后古典社会学的一种理论推进,其中既有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诠释,也有在理论上与当代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与范式展开的深度论辩。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中国的社会学也曾经历过中断与沉寂。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一方面加快了国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吸收,另一方面也开始直面中国社会学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关怀,提出具有本土意识的核心问题。近十余年来,“社会学中国化”已成为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如何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如何通过建构非西方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现实,是每一位社会学学者必须面对的理论课题与实践挑战。以西方文化和宗教传统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建立在19世纪以来欧美哲学与自然科学传统及其知识积淀之上的。然而,在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与问题时,很难将这些概念直接移植过来,并在缺乏反思性前提的条件下应用于社会分析。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本质上要面对社会中具体的人。因此,发展中国社会学,一方面需要充分学习和吸收域外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基于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乃至语言本身,建构和发展出中国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从中国传统经学与历史出发,认识和分析中国人内心世界、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背后的伦理路径,既是迈向“社会学中国化”一种积极的尝试,也是从理论上探究中国社会学概念化的不可忽视的努力。^①

作者简介: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黄永亮〕

^① 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